“一带一路”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

——巴基斯坦藏族后裔的跨界研究为例[①]

○ 银卓玛　拥　巴

摘　要：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如何抓住时代机遇，提升研究空间，并与沿线国家建立平台，实现合作是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带一路”国家众多，“以小见大、以点带线”是实现沿线各国民族音乐研究的主要途径。在诸多的沿线国家中，笔者聚焦巴基斯坦北部的巴尔蒂斯坦这片土地，这是一片与我国历史上有过密切关系，而我们却知之甚少的土地。在国内，对于巴尔蒂斯坦藏族后裔的一手资料极为匮乏，通过查阅、整理，本文以国内外现有文献为基础，对巴尔蒂斯坦藏族后裔的历史、文化、现状及音乐等方面进行梳理，并将可进行跨界音乐研究的巴尔蒂问答歌“索玛莱克”和“格萨尔”说唱进行简述。进而，通过丝绸之路上民族音乐传播的个案分析，阐述少数民族音乐跨界研究与“一带一路”大背景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少数民族音乐；巴尔蒂斯坦；跨界研究；藏族后裔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923(2019)01-0076-07

DOI：10.13812/j.cnki.cn11-1379/j.2019.01.011

“一带一路”即古代丝绸之路[②]的当代延伸，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其核心在于中国与多国的“和平发展”，形成政治、经济、文化相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③]在这样一个国家政治导向中，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发展也应当顺应时代

① 本文为2018年“十六届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年会”的主题发言稿。

② 丝绸之路既是经济的流通，更是文化的传播。丝绸之路分为东、中、西三段，而每一段又可分为中南北三条路线。这9段线路中，属西段南线最为磅礴，即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一路经过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最后抵达欧洲。路上丝绸之路为中国、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海上丝绸之路为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也门、阿曼、沙特阿拉伯、埃及、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利比亚突尼斯、意大利。参见向洁、闫海龙：《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的传承与发展》，《区域经济》，2016年，第5期，第2-5页。

③ 参见程国强：《共建“一带一路”：内涵、意义与智库使命》，《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第4期，第1-2页。

收稿日期：2018-06-13

作者简介：银卓玛(1979-　)，女，藏族，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拥　巴(1966-　)，女，藏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潮流，掌好舵，进行民族音乐的跨界研究，为促进国家间的文化交流而助力。何为跨界民族？其或称"跨境民族"或"跨国民族"，学术界对于"跨界民族"的界定，指的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所谓界，是指国界"。④跨界民族的形成有诸多历史因素，例如民族迁徙、政治扩张或宗教影响等都有可能产生国界的变化，而在国界的变化中，就会产生一些同一民族跨界的现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藏族、佤族、傣族等都存在民族的跨界现象。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巴基斯坦北部的巴尔蒂斯坦地区与中国西藏相邻，又是中亚、西亚、南亚和中国的相交之处，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在古代，巴尔蒂斯坦是吐蕃（土蕃）与西域各国联系的要塞，而且有一条鲜为人知的隐形丝绸路线。根据日籍学者长泽和俊的《东西文化交流史》，文中记载了一条通过吐蕃的路线："土蕃与中亚之路，此路线成为土蕃扩大贸易及西征的重要通道。尤其是古丝绸之路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便是通往印度的要道。"⑤此外，巴尔蒂斯坦至今还有族群拥有藏族血统，可谓藏族的后裔或远裔。如此，笔者聚焦巴尔蒂斯坦藏族后裔的音乐作为本文的论点，以此，阐述巴尔蒂人与中国藏族跨界音乐研究的可能性。

笔者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处于巴尔蒂斯坦的巴尔蒂人与吐蕃在文化方面形成交融，这其中就包括音乐的跨界，从而形成边界文化交融的巴尔蒂藏族文化遗存。由此，以小见大，浅述以"一带一路"为时代背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如何抓住机遇，实现丝路沿线国家间的跨界民族的研究。

一、藏族后裔之巴尔蒂人（Balti）

巴尔蒂斯坦（Baltistan）位于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巴基斯坦北部的印巴边境，北邻中国新疆，西与Gilgit（吉尔吉特）大区接壤，东南与拉达克，西南与克什米尔地区接壤。巴尔蒂人的聚集区与中国的西藏相邻，早期，此地被称为"little Tibet"（小西藏）。巴尔蒂斯坦的巴尔蒂人（Balti，藏文为བལྟི་ཡུལ་པ）属于藏族人的后裔，当地有91%的人为藏裔。2010年，巴尔蒂斯坦享有自治权利，辖7个县，其中，巴尔蒂藏族后裔主要聚居在斯卡杜县（Skardu）和甘切县（Ganche），他们生活在此地已有近千年的时间。其首府为斯卡杜（Skardu），有近30万人口（1998年统计）。⑥

图1 巴尔蒂穿着与藏服相似服饰的少女们 ⑦

巴尔蒂斯坦在西藏文献中称为"Bru sha"（音"竹夏"）、唐代文献称"大勃律"、巴基斯坦称为"Pololo"⑧（钵露罗），克什米尔人称为"产杏的Tibet"。"我国古称波路、钵露罗、大勃律等地，土蕃时为土蕃的属国"⑨。公元7世纪到8世纪中叶，吐蕃为了与西域各国沟通和开展贸易，长期经营并掌控着大勃律（巴尔蒂斯坦）和小勃律（吉尔吉特）。并通过大、小勃律过胡密，东西抵达四

④ 金春子、王建民：《中国跨界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页。

⑤〔日〕长泽和俊：《东西文化交流史》，《西北史地》，张英莉译，1984年，第3期，第1页。

⑥ 参见〔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著：《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陆水林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⑦ 参见藏人文化网（http://www.tibetcul.com/zhuanti/whzt/201707/42821.html），2017年7月1日。

⑧ 参见刘洁：《勃律与西藏苯教、藏传佛教关系考略》，《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1页。

⑨ 陆水林：《1840-1841年西藏与森巴在阿里地区之战原委》，《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第5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镇、吐火罗德的通道,这条通道对于经过克什米尔、帕米尔到达中亚具有重大作用。巴尔蒂斯坦在古丝绸之路上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直至当代,在"一带一路"战略中仍不可忽视。

当代的巴尔蒂人是一支已经被伊斯兰化的族群,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什叶派。[10]虽然如此,但也保留着一些藏族的文化特性,例如在语言、服饰及生活饮食习惯等方面都有藏族文化的保留。据巴基斯坦学者艾哈默德·哈桑·达尼著《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一书中这样记述:"以斯卡杜为中心的巴尔蒂斯坦西部地区的居民操巴尔蒂语,这是一种藏语方言。接近于拉达克话,巴尔蒂人和拉达克人能听懂彼此的语言。"[11]其巴尔蒂语属于古藏语,与安多藏语接近,巴尔蒂人至今还保留喝酥油茶、吃糌粑的习惯。

(一)巴尔蒂人的历史脉络

巴基斯坦籍学者艾哈默德·哈桑·达尼是一位致力于研究巴尔蒂斯坦历史文化的本土学者,其研究成果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前沿性和深度,著有《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等论著,成为笔者关于巴尔蒂人历史脉络梳理的重要参考资料。

巴尔蒂人生活的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通常指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大部分地区,也就是巴尔蒂斯坦和吉尔吉特地区(从最早时期至1985年12月)。[12]"巴尔蒂人口的基本单位不是血亲群体,而是居家的群体。"[13]1532年,其首府是希格尔堡。[14]1381年,阿里· 哈姆达尼从克什米尔前往巴尔蒂斯坦传播伊斯兰教。[15]"大约在公元1600年前后,赛义德·马茂德·沙·图西(Sayyid Mahmud Shah Tusi)和赛义德·阿里·图西(Sayyid Ali Tusi)两兄弟经萨尔托洛在巴尔蒂斯坦传播伊斯兰教。[16]追溯其与我国的历史关系:公元7世纪初,在象雄王国时期,巴尔蒂人属于象雄文化圈内。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归属吐蕃统治,信仰藏传佛教。这一时期,此地成为藏族先民游牧和繁衍生息之地,也成为藏族形成和发展的地区之一。吐蕃占领大勃律后,大量军队及随军人员进入该地。吐蕃瓦解时,仍有大量藏族在此地生活下来,成为巴尔蒂人的主体。[17]"公元8世纪,土蕃势力横扫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直至瓦罕。"[18] 公元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消亡后,巴尔蒂逐渐脱离了西藏。1840年成为查漠克什米尔的一部分。后经过独立战争,与吉尔吉特加入巴基斯坦。[19]

关于巴尔蒂斯坦的政治文化及现当代的状况。多伦多大学地理与国际发展研究所的助理教授肯尼斯·伊恩在其《西藏的记忆:巴基斯坦北部的跨国主义、跨文化与文化认同的产生》(Memories of Tibet: Transnationalism, Transcultur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Northern Pakistan)[20]一文中,关于族源"人们正在为辨认身份而斗争"的文化身份跨国性问题,进行了阐述[21]。该文指出,在当地有一个称为"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的非官方民间组织,正在做着保护巴尔蒂藏文化的活动。除文字、佛教遗迹外,民间舞蹈、民间音乐、工艺、语言、食物等都是他们复兴的目标。巴尔蒂人自公元6世纪以来,被要求停止使用藏语。[22]在1999年之前,该地区的人得不到宪法保护,不能参加国家投票,也不能向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自1999年,虽然政府没有直接给北方居民公民身份,但赋予当地自治的权利和独立的司法机构。

⑩ "13世纪末,定居在中亚的蒙古人后裔普遍信仰了伊斯兰教。藏传佛教文化圈内,最早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是当时西藏的附属国拉达克和西藏血统的巴尔蒂。"参见格曲曲杰:《伊斯兰和藏族艺术的结晶——卡尔乐(一)》,《西藏艺术研究》,2007年,第4期,第2页。

⑪⑫⑬⑭⑱ 故纳新参见〔巴基斯坦〕艾哈默德·哈桑·达尼:《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史》,杨柳、黄丽莎译,陆水林审定,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3年,第61、90、95、285、297页。

⑮⑯⑰ 参见陆水林:《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第2、285、2页。

⑲ 参见格曲曲杰:《伊斯兰和藏族艺术的结晶——卡尔乐(一)》,《西藏艺术研究》,2007年,第4期,第2页。

⑳㉑㉒ Kenneth Iain MacDonald.Memories of Tibet: Transnationalism, Transcultur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Northern Pakistan. *India Review*, vol.5, no.2, April, 2006, pp.190-219.p.190.pp.194-195.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政府与当地有一定的政治疏远感，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疏远感加剧。[23]同时伴有一种歧视和异化。所以，激起了巴斯蒂人的文化认同意识，激励他们学习文化，并通过对自身文化的掌握，使之成为防御政治压迫的工具，从而获得双边的国际交往。[24]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对于巴尔蒂人而言，也是一个时代机遇。此外，文章还对当地民间艺术进行了概述，其中巴尔蒂人的格萨尔史诗，至今仍然在较为年长的老人之间传唱，且当地很多地区和城市的名字仍然沿用藏语称谓。[25]

图2 巴尔蒂斯坦挂有藏文字和藏传佛教象征“雍仲符号”的商店[26]

在巴尔蒂斯坦始终以“雍仲符号”(卐)为吉祥的符号。[27]这一符号除了日常的房屋、墙壁、装饰等外，还出现在当地清真寺或伊斯兰修道院等的建筑物上。这也是巴基斯坦其他地区所罕见的。

（二）巴尔蒂人与吐蕃在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

还是依据日本丝绸之路研究专家长泽和俊所著的《东西文化交流史》一文可知，丝绸之路有三条东西干线，即北方草原路、中亚绿洲路、南方海路。其中，吐蕃与中亚的路线，成为吐蕃扩大贸易及西征的重要通道。[28]那么，关于巴尔蒂人与吐蕃在古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的往来，一些外文资料有零星的记载，比如：《穿越小西藏的一个旅行》(A journey through lesser Tibet)[29]、《关于喜马拉雅山脉居民的记述》(Notes 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Himalayas)[30]、《在伊斯兰教的起源中的中世纪西藏》(Medieval Tibet in Perso-Islamic Sources)等。其中，《在伊斯兰教的起源中的中世纪西藏》(Medieval Tibet in Perso-Islamic Sources)陈述了在早期的西藏，大量的伊斯兰商人入境到西藏，从西藏贩卖黄金和麝香回国。在波斯人眼中，西藏的麝香是最好的东西，在穆斯林市场上占有特殊地位，对穆斯林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所以，最终使一些藏族商人移居到相邻或接壤的国家，以此推动有利于自己的贸易。[31]此外，根据巴基斯坦当地学者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所著的《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的书中记述，证实了吐蕃与巴尔蒂斯坦通过丝绸之路进行麝香买卖的事实，书中这样写道，“土蕃的麝香确实经土蕃—勃律道运抵中亚。”[32]除了吐蕃通往巴尔蒂斯坦的交易外，也有巴尔蒂人通过古道前往吐蕃的买卖活动，例如李强、纪宗安所著的《17-19世纪喜马拉雅地区的羊绒贸易和战争》一文，就有相关记述：“西北方向还有通过斯卡杜前往兴都库什山区一些穆斯林聚居区的商路，在夏季这条道路上有前往高寒

㉓㉔㉕㉖ Kenneth Iain MacDonald.Memories of Tibet: Transnationalism, Transcultur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Northern Pakistan. *India Review*, vol.5, no.2, April, 2006, p.198.pp.201-202.p.210.p.193.

㉗ 雍仲符号“卐”代表佛祖的心印。“雍”是永恒和谐的象征，而“仲”则是世俗无灭的意思。

㉘ 参见〔日〕长泽和俊：《东西文化交流史》，《西北史地》，张英莉译，1984年，第3期，第1-3页。

㉙ Mrs. Bishop F.R.S.G.S. . A journey through lesser Tibet.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8:10,1982,pp.524.

㉚ Colonel Tanner. Notes on the inhabitants of the Himalayas.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7, 1891, Lssue 11, pp.581-585.

㉛ Reza. Medieval Tibet in Perso-Islamic Sources. *Himalayan and Central Asian Studies*, New Delhi Vol.17, 2013, pp.1-12.

㉜〔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著：《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陆水林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的拉达克和西藏贩卖杏干的巴尔蒂人。”[33]由此,通过文献可以获知,巴尔蒂斯坦与吐蕃在古丝绸之路上早已有贸易关系,且为了买卖的便利,两国商人都有跨国移居的现象。

综上,通过对巴尔蒂人历史脉络的梳理及古代丝绸之路上两国贸易往来的查阅,笔者认为,巴尔蒂斯坦是藏族人的后裔,其原因有三:第一,巴尔蒂土著与我国西藏山水相连,均属喜马拉雅山脉的族群;第二,巴尔蒂斯坦在古代象雄、吐蕃时期开始,曾直接受藏地管辖。吐蕃军队及部分民众迁移至巴尔蒂斯坦,并与当地土著融合;第三,在古代贸易往来中的民族迁移的现象确有发生。

二、巴尔蒂人的民间音乐及可能涉及的跨界研究

1982年,国家地理刊登了一篇关于“小西藏”的纪实性文章。文章中就提到了当地人在劳动时唱着“刺耳且不和谐”的歌曲,且民歌题材广泛,大多数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多方面地反映了该地的社会生活。[34]此外,据国内学者陆水林的译著及其去实地调查后的文本反馈,巴尔蒂民间音乐种类较多,例如“赫里卜”(Harib)、“拉姆纳”(lam-na)、“塞加尔”(Hrsekar)、“萨德迦拉”(Staghra)、“赫罗加尔”(Khalu-kaar)、“索玛莱克”(Som－lake)及史诗《格萨尔王》(Gesar)等。其中,体现藏文化遗存的民间音乐有“索玛莱克”(Som－lake)和《格萨尔王》(Gesar)说唱。而且,“索玛莱克”(Som－lake)与中国西藏阿里藏族的“鲁夏”(对歌)音乐风格相似,《格萨尔王》(Gesar)与中国西藏、青海等藏族地区所流传的《格萨尔》说唱也非常相近。

(一)民歌之问答歌“索玛莱克”(Som－lake)

根据古拉姆·哈罗·罗布桑所著的《巴尔蒂斯坦的创世问答歌——索玛莱克》一文,可知“索玛莱克”(意为问答),是一种通过一问一答、蕴含人生哲理且具有苯教超现实主义哲学印记的民歌。例如,文中有一段歌词这样记录:

尘埃(云彩)又变成了什么?哎,索玛莱克。尘埃(云彩)变出了三个世界。哎,索玛莱克。第一个世界叫什么名字?哎,索玛莱克。第一个世界是底下的,叫做龙的世界。哎,索玛莱克。第二个世界叫什么名字?哎,索玛莱克。第二个世界是上面的,叫做众神的世界。哎,索玛莱克。第三个世界叫什么名字?哎,索玛莱克。第三个世界就叫做中间的世界。哎,索玛莱克。[35]

如上,这首“索玛莱克”的唱词涉及宇宙起源的内容。此种体裁的民歌,实为以“索玛莱克”为衬词,并以此命名,体现的是一种固定的结构模式。通过一问一答进行歌唱,为对话体民歌。这与西藏阿里藏族中流传的民歌“鲁夏”(对歌)非常相似,“鲁夏”的歌唱形式也为两人或多人对唱,有问歌和答歌两种,通过对歌问答,达到比智慧、比知识的目的。[36]除了演唱形式的相似外,巴尔蒂斯坦的“索玛莱克”与西藏阿里的“鲁夏”均是宗教与哲学相结合的民歌。

(二)《格萨尔》说唱

“格萨尔”在藏族民众心中是杰出的军事家和体育家,在史诗中有很大的篇幅描写了格萨尔出众的马术、刀术,其武功盖世,并可斩杀一切恶势力。这一英雄主义形象深入人心。如出一辙,巴尔蒂的《格萨尔》与中国藏族传唱的《格萨尔》从其内容及在民众心中的地位来看,都是一样的。

巴尔蒂斯坦的《格萨尔》,由于发音问题,巴尔蒂人称为《盖瑟尔》。此说唱在当地流传较为广泛,在巴尔蒂文化中占据核心的位置。[37]1980年

㉝ 李强、纪宗安:《17-19世纪喜马拉雅地区的羊绒贸易和战争》,《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第3页。

㉞ Mrs. Bishop F.R.S.G.S. . A journey through lesser Tibet. *Scottish Geographical Magazine*, 8:10, May, 1982, pp. 513-528.

㉟ 参见〔巴基斯坦〕古拉姆·哈罗·罗布桑:《巴尔蒂斯坦的创世问答歌——索玛莱克》,陆水林译,《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1－2页。

㊱ 参见格桑曲杰:《世界屋脊之巅西藏阿里的民歌风格、特色区域及种类》,《西藏艺术研究》,1995年,第2期,第4页。

㊲ 参见〔巴基斯坦〕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陆水林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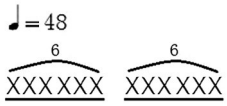
9月，巴基斯坦学者阿巴斯·加兹米在巴尔蒂斯坦录制了由当地歌者阿卜杜尔·拉赫曼·米斯德里巴演唱的《格萨尔》，此曲较长，共12章，10盘磁带。与拉达克的《格萨尔》较为接近。歌者阿卜杜尔·拉赫曼·米斯德里巴出生于1930–1933年间，师从斯卡杜艺人穆哈玛，老人穆哈玛记得全部的《格萨尔》，常在当地民众的家中演唱。老人在世期间，阿卜杜尔·拉赫曼·米斯德里巴学会了大部分的《格萨尔》。之后，他逐渐成为当地较为著名的艺人，代替师傅在人们家中演唱，在当地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地位。他演唱的12章《格萨尔》篇幅长大，涉及格萨尔生平及英勇杀敌的众多神话故事。通过阿巴斯·加兹米对巴尔蒂《格萨尔》的研究，并结合当地民歌和风俗，可知，当地《格萨尔》受到苯教的影响非常大。巴尔蒂斯斯坦在1200年前，信仰的就是藏族苯教。此后的600年间，逐渐改信藏传佛教。在这之后的600年间，乃至当代，巴尔蒂人开始信仰伊斯兰教。所以，在当下受伊斯兰教统治已有600年的巴尔蒂斯坦，苯教信仰时期的遗存较之更为多见。虽然，巴尔蒂人已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但仍会信仰"拉"（山神）及"鲁"。尤其在《格萨尔》的神话史诗中更会体现出一些与苯教相关的内容，且代代相传至今。

巴尔蒂斯坦虽然已经没有了可以完整演唱《格萨尔》的艺人，但有一些艺人、马球手和统治者都能记得故事的韵文部分及音乐。且广泛的运用于日常生活的不同场合，如劝慰、告诫、赞叹和谴责等。尤其是当地举办马球比赛时，其获胜方便会有队员坐在马背上念诵《格萨尔》中的韵文部分，以示激励，从而增强斗志，这一事象已成为马球运动中的一项重要环节。由此，几乎所有的马球手都会去学习《格萨尔》故事的内容、曲调及含义。此外，与中国境内的格萨尔遗迹一样，当地也会为一些独特的自然景观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比如：将奇特的巨石等比喻成格萨尔的马鞍或拴马柱等。㊳

非常遗憾，笔者还没有搜集到巴尔蒂斯坦《格萨尔》的一手资料。但通过已有资料与当下中国藏族的《格萨尔》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国的《格萨尔》在本体上也有很多的相似性。例如，都包括史诗文字和说唱音乐两大要素。且讲述内容都涉及格萨尔在天界时的情况、神子下凡、格萨尔成婚经历、与敌王妻子合谋杀敌王、霍岭大战及营救王妃等叙事环节。其中，巴尔蒂斯坦和中国藏族《格萨尔》中，"说"的部分都是具有固定节奏的唱诵形式。中国藏族《格萨尔》的唱诵节奏如下：

谱例1

银卓玛记谱



可见，中国藏族《格萨尔》的唱诵部分，节奏固定而紧凑。除唱诵外的音乐部分，是一种固定曲调的即兴填词。同一部《格萨尔》一般有2个或多个不同的曲调组成，且均为一句体的反复连缀。如谱例2、谱例3所示，同一部《格萨尔》中的两个曲调：

谱例2

格萨尔曲调一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银　卓　玛记谱

采录时间：2008年7月

唱词大意：

勒阿拉拉木阿拉热兰，麻塔拉拉木塔拉热兰，佛法僧三宝，众神师本尊空行佛。

㊳ 参见〔巴基斯坦〕S·M·阿巴斯·加兹米：《巴尔蒂斯坦地区流传之<盖瑟尔>传说概况》，陆水林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年，第6期，第2－8页。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谱例3

格萨尔曲调二

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
银　卓　玛记谱

采录时间:2008年7月

唱词大意:

佛意妙音能指引解脱,虔心祈祷三身,引导众生超脱六趣。

如上,中国藏族的《格萨尔》是说与唱并重的形式,颂唱结合、曲调委婉,且依声填词,曲调连缀反复。通过看似简单的曲调,一遍一遍地反复,使得不断深化的唱词表达出感人至深的故事和人生哲理,并宣扬宗教教义,达到人性启迪的目的。

由于中国藏学界音乐人才的缺乏,使得国内对于《格萨尔》的研究,在很多年间,一直呈现出一种只注重文学部分的研究形式,非常缺乏对于音乐的关照和分析。笔者通过对巴基斯坦及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搜集、研读后发现,关于巴尔蒂斯坦《格萨尔》的研究工作,也非常缺乏音乐部分的分析与研究。巴尔蒂与中国藏族《格萨尔》的对比研究,将会成为研究巴尔蒂民间文学、风俗习惯及不同国界藏族音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同一音乐种类的跨界研究较有意义,可以呈现这一音乐事象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发展、演变及地位,为丝绸之路的文化交融研究提供一些线索和理论依据。

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文明能够摆脱另一种文明的影响,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地理上的障碍或恶劣的地形是无法阻挡人类的发展的。中国西藏独特的地理位置,因其与中东、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接壤,使之成为文化的重要区域之一,影响着邻国,相反也会受到别国的影响。

三、跨界音乐研究与"一带一路"的关系

巴尔蒂斯坦与我国西藏山水相连,曾受藏地管辖。又处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之中,与不断涌入的突厥人、伊朗——雅利安人、希腊人等不同人种的民族和文化相融合,又先后信奉过西藏苯教、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已经成为一个多元的文化族群。巴尔蒂人既有藏族人的特性,又具有他族的文化特点,这与"一带一路"所提倡的既有共性,又有差异性是相通的。如此,伊斯兰化又具有藏族血统的巴尔蒂人,在历史长河中,经历过种种后,依然保存着具有藏族文化遗存的民歌和《格萨尔》说唱,这是丝绸之路上不可多得的音乐文化遗产,更是跨界族群在丝绸之路上文化迁移现象的实例。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巴尔蒂藏族后裔的音乐文化研究还很薄弱,尤其缺乏珍贵的一手资料。巴尔蒂斯坦只是丝绸之路中的一个族群,以此为契机,可以逐渐打通贯穿吉尔吉特、印度拉达克等地,进一步对具有藏族血统的跨界民族音乐进行研究。跨界民族有其特殊的文化身份,应当受到重视,跨界研究应顺应时代潮流,在"一带一路"的时代潮流中得到重视。这一研究既可以重现当年丝绸之路上的文化景象,又可促进当下的文化交流。

同时,作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应该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以国家政策为依托,开展具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有实践意义的考察与研究，这有利于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音乐文化研究工作。

小 结

巴尔蒂人的藏族因素，对于他们的文化认同，会产生一种跨文化话语。这是一种连接、巩固、赋予跨越时空的意识形态的声音。笔者通过对巴尔蒂斯坦藏族后裔音乐研究成果的搜集、研读，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于巴尔蒂藏族后裔的民间音乐关注较少，且缺少深入的专业音乐研究。甚至，在国内外的相关网站上，也几乎没有找到与巴尔蒂藏族后裔相关的、有价值的音乐材料。对于这样一片与我国历史上有过密切往来的土地，我们对于他们的文化却知之甚少。因此，笔者希望借着"一带一路"的时代机遇，加紧搜集与巴尔蒂斯坦藏族后裔族群音乐文化相关的一手资料，并逐渐将吉尔吉特、印度拉达克等地也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形成较全面的对藏族跨界音乐的观照。

若反问巴尔蒂斯坦的跨界音乐研究与"一带一路"及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有什么关联？笔者认为，此研究只是一个点，相似的研究对象在"一带一路"沿线还有很多。也就是如此点点滴滴的个案研究，才终将汇聚，完善、充实整个沿线各国民族音乐的研究领域。希望我们每一位民族音乐研究者，更多地响应国家政策，加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音乐研究的队伍中。我们的形式可以多样化，即逐渐实现考察、实践、沟通以及建立学术平台。尤其，可以与沿线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合作，建立交流机制，以此提升合作空间，加强民族音乐的研究。逐渐以小做大，最终实现"一带一路"上各国民族的音乐研究和交流。

笔者认为"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的双边，更应该是文化的双边。多进行丝路各国间的交流、研究，创建一些共同的音乐研究及教育合作平台，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学者的使命，让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得到更广阔、更健康的发展。民族音乐研究，尤其是跨界研究，更具有民族情感基础，通过音乐研究和沟通，为民心建立桥梁，可以为促进国家间的文化共建，以此推动沿线各国的人文合作。

综上，加强沿线国家的民族音乐研究是对"一带一路"教育工作的支持。希望我们以文化交流为契机，建立联系，挖掘更多的一手资料，达到文化双边共赢的目的。借着"一带一路"的东风，开展少数民族的跨界研究。对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而言，结合学科特点走出自己的特色、抓住时代机遇得以推动学科发展才是重任。

责任编辑：樊 荣

（上接第46页）

学、科研和学术论文写作实践中，既需要加强关于问题意识树立的理性认知，也需要明确问题意识树立将是一个不断实践和不断积累经验的修炼过程。

只要音乐学教学人员和音乐学学习者，能够充分理解问题意识树立的积极意义和学术价值，能够充分理解问题意识培育和提升的重要性，能够根据自身条件合理的设计出问题意识培育和提升方案，能够将其理性认知和设计方案在其相关教学和研究实践中予以实验和操作，那么终会在其音乐学教学、音乐学研究和音乐学论文写作等成果中，表现出一位教学者、研究者和学习者应有的创新意识和较高学术水准。

责任编辑：樊 荣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